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5/102
18 February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7

增进和保护人权

有罪不罚现象

更新《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一套原则》独立专家的报告

迪亚娜·奥伦特利歇尔 *

* 本报告提交时已过截止期，是为了将所有答复以及 2004 年 11 月举行的专家研讨会的结果考虑进去。

内 容 提 要

根据委员会第 2004/72 号决议，对《通过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行动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原则》)作了更新，以“反映国际法和惯例的最新事态发展，包括国际判例法和国家惯例，同时考虑到”秘书长根据第 2003/72 号决议就有罪不罚问题委托专家编写的“独立研究报告”(E/CN.4/2004/88)。因此，《独立研究报告》以《原则》为评估框架，指认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一些最佳做法。

国际法最近的情况发展对《原则》作了大力肯定，同时也进一步澄清了国家既定法律义务的范围。因此，更新的案文大致确认并保留《原则》1997 年提议的案文(E/CN.4/Sub.2/1997/20/Rev.1, 附件二)，同时根据国际法最近的发展对应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澄清。虽然大多数修订反映了实体国际法最近的发展情况，但有些修订则反映《原则》提出以来在体制方面的主要发展，如既包含国内成份，也包含国际成份的新一代法院的出现。

有些修订反映了最近国家惯例的新发展：除了在揭示国际法的新兴原则或确认既定法律规范方面有潜在的相关性以外，最近的这些发展还就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有效战略提出了宝贵的见解。例如，最近的经验证明推动受害者和其他公民，特别是妇女和少数人群体广泛参与设计和执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修订的案文反映了这种经验，但对于应该通过国家审议予以解决的问题，修订案文避免使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同时则从各国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不断丰富的经验中提炼普遍有用的见解。

有些修订反映了国家、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在法律程序全面瘫痪后对解决严重的司法问题发挥主要作用的累积经验。更新的原则对这种经验作了提炼，例如，它承认必须将全面的体制改革看作是民主过渡期可持续司法的基础。

从较大的范围来看，《原则》修订案文所根据的发展情况，代表了国家和国际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显著进展。在经受了独裁统治的国家，妨碍起诉的似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已经被克服；一种既含有国内成份，也含有国际成份的一种新兴法院进入了对残暴罪行作裁判的机构名册；各国提供合作，确保向国际、国际化和国内法院控告政府最高级官员；政府和民间社会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获得的工具数量不断增多。由于上述新发展，因此必须对《原则》作更新，但《原则》本身也对促进这些发展发挥了异常大的影响。

《原则》的修订案文载于 E/CN.4/2005/102/Add.1 号文件。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11	4
一、对更新的《原则》的评述.....	12 - 70	6
A. 定 义.....	13 - 16	6
B. 知情权(原则 2-18).....	17 - 35	8
C. 取得公理的权利(原则 19-30).....	36 - 57	12
D. 获得赔偿权/不再发生的保证(原则 31-38).....	58 - 69	17
二、结 论.....	70	21

导 言

1. 本报告根据 2004/72 号决议提交，人权委员会在决议中请秘书长任命一名独立专家，任期一年，目的是更新《通过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行动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E/CN.4/Sub.2/1997/20/Rev.1, 附件二)(《原则》)，“以反映国际法和惯例的最新发展，包括国际判例法和国家惯例，同时考虑到“秘书长根据第 2003/73 号决议委托专家编写的关于有罪不罚的“独立研究报告”(E/CN.4/2004/88)以及各国、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根据第 2004/72 号决议提供的资料和意见。

2. 第 2004/72 号决议提到的独立研究报告确定了“最佳做法，包括建议，以帮助各国加强本国的能力，从各个方面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同时考虑到”《原则》“及其适用情况，反映最新事态的发展，还应考虑到这套原则的下一步执行问题”¹ 研究报告反映的最近的新发展包括“1997 年以来国际法和国家惯例的主要发展”，² 这一年，《原则》由关于侵犯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者有罪不罚问题特别报告员路易斯·儒瓦内提交当时的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并根据小组委员会第 1997/28 号决定提交人权委员会。根据第 2004/72 号决议，并根据国际法和惯例最近的发展，包括独立研究报告指出的最新发展以及更近期的发展，对《原则》作了更新。

3. 除了政府提供的资料外，³ 本报告还得益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2004 年 11 月 18 日和 19 日在日内瓦举办的一次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举行，是为了促进独立专家与来自各地区(非洲、亚洲、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交换意见。参加研讨会的还有人权高专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独立专家还要感谢大赦国际、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委员会、国际人权联合会、人权观察社、国际过渡司法问题中心、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开放社会司法倡议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平反信托中心等组织分别作出的贡献。⁴

4. 独立研究报告承认，虽然“《原则》的一些方面……能得益于更新”，以反映国际法和国家惯例的重要的新发展，但国际法的最新发展从总体上对《原则》作了肯定，并突出了这些原则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国内努力所作出的贡献”。⁵ 实际上，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原则》已经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产生了很大

影响。”⁶ 因此，载于本报告增编(E/CN.4/2005/102/Add.1)的更新案文，大致上确认并保留了小组委员会 1997 年提议的《原则》，同时也反映了有关的新发展。

5. 凡作出修订的地方，都反映了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较详细的解释见第一节，该节按必要性或有用性对这些一般性叙述作补充)。大多数的修订反应了国际法最近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体现在国际法院、人权条约机构、国内法院以及国家惯例的其他方面。这些新发展大都进一步澄清了国家在国际法下的既定义务的范围，同时也普遍确认了与之有关的原则。

6. 在有些情况下，最近的新发展突出了某些原则或者整个《原则》所依据的前提的相对重要性。有些修订反映了这种新发展，只是相应改变了轻重缓急的次序，但对《原则》本身没有作更改。例如，最近的新发展大力证实了《原则》的中心前提——“打击有罪不罚现象需要采取全面的办法”。⁷ 为突出这项原则的至关重要性，经修订的案文将原为原则 18 第 1 段的案文列作第一项原则，它承认国家为履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义务而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措施。⁸

7. 另一类修订大体反映了国家惯例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除了在揭示习惯法的新兴原则或证实既定规范方面有其潜在相关性以外，还对制定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有效战略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在这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是，最近的经验证实：促进“受害者和其他平民广泛参与”“制定打击有罪不罚的政策”。⁹ 他们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政策有效地响应受害者的实际需要，其本身“可以帮助过去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人重新获得充分的公民地位”。¹⁰ 广泛的磋商还有助于确保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政策本身扎根于确保公众问责制的进程。最后，通过全国磋商而形成的计划，用秘书长最近关于冲突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的话来说，比起外部强加的方案，更有可能按照国际标准、国内法律传统和民族愿望……确保未来的可持续司法公正。”¹¹

8. 最近的经验还表明，只有协力确保男女平等参加制定和执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政策，才能有效实现《原则》的目标。例如，《原则》确认，调查委员会应“特别注意侵犯妇女基本权利的行为”；¹² 最近的经验表明，在真相调查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组成中确保男女平衡，促进了这项目标。

9.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政策应通过公众磋商予以广而告知，特别要包括受害者的意见，这项原则与独立研究报告的另一项结论密切相关：“尽管各国必须履行

国际法的义务，……但对严重侵犯人权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办法。”¹³ 秘书长的上述报告(见第 7 段)论及联合国在支持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中的作用，也同样认为：“我们必须……避免以同一个办法套用于所有情况和完全照搬外国模式，而是把我们提供的支持建筑在国内评估、国民参与以及国家需要和愿望的基础上。”¹⁴ 经更新的原则案文在反映上述两种从最近的广泛经验中得出的真知灼见的同时，有时也反映了公众磋商在形成反有罪不罚现象措施中的重要性。

10. 在根据第 2004/72 号决议指明的因素更新《原则》的过程中，独立专家作了一些更改，以保证《原则》容易适应于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更笼统地说，保证使原则更加明确。在有些情况下，对《原则》的案文作修订，是为了反映对小组委员会在 1997 年提交《原则》时所附的报告中原来提供的意义作的说明。¹⁵ 有些修订还为了保证英文本尽量贴近于《原则》的法文原文。独立专家指出，《原则》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在含义上有所不同，法文本较好地反映了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最后，有些原则的案文作了必要的更新，以反映其他原则中作的修订。

11. 独立专家的任务是：更新《原则》，“以反映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包括国际判例和国家惯例最近的新发展，”以及第 2004/72 号决议列明的其他考虑。有鉴于此，应该强调，“这些原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标准，而是指导原则。”¹⁶ 第 2004/72 号决议通报了特别报告员更新《原则》的方法，它的前提显而易见，即尽管这些原则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管怎样应反映并遵守有关的法律标准。

一、对更新的原则的评述

12. 本文所用的“《原则》”一语系指 E/CN.4/Sub.2/1997/20/Rev.1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的原则全文，而“原则 1”等形式的提法指的是该案文的具体原则。“经修订的案文”、“经更新的案文”、“经修订的原则”和“经更新的原则”等等短语系指根据第 2004/72 号决议更新的案文。经更新的原则载于本报告增编。

A. 定 义

13. 经更新的“国际法下的严重罪行”的定义反映了最近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人权条约机构和国内法院对有关法律澄清。以前的定义分开提及“战争罪”和“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而经修订的案文则反映严重违约只是更广泛的一类战争罪中的一小类，而且正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¹⁷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¹⁸ 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各自的规约，¹⁹ 以及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判例²⁰ 所承认的那样，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也构成战争罪。“违反国际保护的人权的其他行为，如属于国际法下的罪行和/或国际法要求国家惩治的罪行，例如酷刑、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奴役等等”，这句话已被包括进经修订的定义，以反映人道主义条约机构的判例、²¹ 国内法院²² 和各国际刑事法院²³ 的判例、有关条约的案文²⁴ 以及联大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决议。²⁵

14. 经修订的案文采用了“真相委员会”一语，这是一种特别的调查委员会，因为这种委员会作为行使知情权的一种机制，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在专门或仅涉及与真相委员会有关的标准时，经更新的案文采用了这一用语。²⁶ 增编所载的定义大致沿用了秘书长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中所用的定义。²⁷

15. 经更新的案文还导入了“档案”的定义，这一术语对若干原则至关重要。该定义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但若干问题应作简短的评述。第一，原则 4 和 13-17 主要关注的档案是政府机构所拥有的涉及严厉镇压时期的档案，但近年来，真相委员会的数量剧增，它们自身的档案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因此更有必要解决与这种档案材料的来源有关的问题。第二，根据职业档案惯例，“文件”一词所包含的形式范围很广，如纸张(包括地图、图画和招帖等)、电子记录(如电子邮件、文字处理记录和数据库等)、照片、电影、录相带和录音带等等。最后，虽然经更新的原则所用的定义着重于官方来源，但外国政府、国内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学、国际组织等搜集的涉及侵犯人权的材料也对社会能否行使了解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方面的真正的权利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非国家组织以及个人收集、保留和提供与这种侵权行为有关的文件的权利。

16. 经更新的案文保留了《原则》中“有罪不罚现象”的定义。该定义应按照原则 18 第 1 段/经更新的原则 1 去理解，它明确指出，国家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履行其中一项义务，如确保对犯下国际法所指严重罪行的人进行起诉的责任，并不解除各国的其他独立义务，包括有关赔偿、知情权的义务，更笼统地说，有关不再发生侵犯行为的义务。

B. 知情权

17. 特别报告员为处理《原则》这一节而采用的方法贯穿着两项重要的考虑。第一，最近国际判例法和国家惯例的新发展有力地肯定了个人和集体的知情权，虽然各条约机构对这项权利的范围的界定略有不同。²⁸

18. 第二，《原则》拟订以来这段时期²⁹在真相委员会方面的广泛的全球经验表明，“受害者和其他公民的参与”(见上文第 7 段)对涉及集体方面的知情权的讨论特别重要。对原则 5-12 的修订反映了这一经验，修订的案文在应通过国内讨论予以解决的问题上避免采用直接了当的语言，同时从最近真相委员会的经验中吸收了普遍有益的见解。

19. 同时，经更新的案文承认关于知情权的有些问题必须适用既定或正在形成的国际标准。例如，是否或何时建立真相委员会的问题应通过全国讨论来决定，而国家必须保护档案，使社会能够行使了解过去迫害的真相的权利的原则，则普遍适用。

1. 一般原则

20. 经修订的原则 2 相当于原则 1，其第 1 句的英文本将“systematic, gross”(一贯严重)改成“massive or systematic”(大规模或有系统地)。作此更改，使英文本与法文原文所用的“massive ou systématique”一语相符。除了与法文原文相一致以外，作这种更改，比原则 1 的英文本更好地反映了最近的惯例和国际法。在惯例方面，真相委员会的授权在总体上没有将委员会调查局限于既有系统又严重的侵犯行为。在相关法方面，法文本的用语援用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人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判例³⁰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3 条和《罗马规约》第 7 条第 1 款中反映的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上述渊源分别将危害人类罪界定为某些大规模或有系统地作出的行为。最近的真相委员会的授权所包含的罪行通常不一定达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但这种国际罪行的发生却是建立真相委员会的典型基础。

21. 经修订的原则 3 的标题和案文围绕国家“保留记忆”的责任而制定。这样遣词用语，是为了在不改变原来原则 2 的意义的情况下使其更明确，原则 2 用了“铭记……责任”一语。换句话说，经更新的案文是为了对原则 2 第 2 句、《原则》中

具体指导如何实施原则 2 的原则(尤其是原则 13-17)以及《原则》所附的评述³¹所反映的原来用语的真实意义作明确说明。

22. 经修订的原则 5 是对原则 4 的更新,将原则 5 的第 1 段合并,它反映了两种考虑。第一,经更新的案文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这样的含义,即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可以替代司法机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基本作用,³²因此它删除了“如果缺乏司法体制”一语。实际上,最近的经验突出表明司法机构在澄清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方面作出了独立的贡献。³³原则 7(a)明确证实,真相委员会“无意替代民事、行政或刑事法院”;经修订的原则 5 只是强化了这一点。第二,按照上文第 7-9 和 18 段所述的考虑,经更新的案文不言自明地认为,关于是否建立真相委员会的决定,应在当地的条件允许自由安全地开展讨论时通过进行全国性的讨论来作出,³⁴虽然国际支持能大力促进国内讨论,并对委员会的成功运行可能是至关重要的。³⁵

2. 调查委员会

23. 原则 5 第 2 段规定:“为了恢复受害人、其家属和捍卫人权者的尊严,[调查委员会]进行的调查的目的应是确保原来一直遭到否认的事实真相得到承认。”这一段案文在原则 6 第 2 段中作了修订,它将“为了恢复……尊严”改为“考虑到……尊严”,而且不提“捍卫人权者”。第一项更改,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这样的含义,即:犯残暴罪行的人剥夺了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固有尊严。第二项更改,是为了强化原则 5 第 2 段对人权侵犯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的核心关注,同时又不改变这项原则的意义。受害者可包括,而且确实常常包括捍卫人权者。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原则笼而统之地提及受害者,即包括了他们的地位。³⁶同时,经修订的案文处理了原则 5 第 2 段明确提到捍卫人权者所引起的关注,它保留了该段中的建议,即真相委员会进行调查的目的特别是为了“确保原来一直遭到否认的事实真相得到承认”。如《原则》评述所解释的那样,承认“压迫者为诋毁人权倡导者而指责后者编造谎言”的事实,是“为这些倡导者恢复名义”的一种方式。³⁷

24. 经修订的案文保留了原则 6(a)的目标,即确保调查委员会的独立、公正,更笼统地说,确保它的承担责任,它总括地将其中心原则纳入经修订的原则 7 的标题,同时避免看上去会限制应在国家的背景下处理的决定的语言(如“委员会应依法建立”等等)。最近的经验表明,建立对公众承担责任的真相委员会,最适当的途径

可能有各种各样，要取决于各国法律制度及其国内经验的具体特征。有些真相委员会是通过国家行动创建，是按立法建立的，还有一些则按总统令建立。³⁸

25. 经修订的原则 7(a)在后面一句增加了一段话：“除失去行为能力或行为使之不适合履行职责的理由并根据确保公平、公正和独立决定的程序以外”，这一句来自原则 6(b)，它确保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间不受撤换。新的案文根据《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³⁹ 应将它理解为只根据确保公平、独立和公正决定的程序而撤换的合法理由，如腐败行为。

26. 为了与原则 6(c)的法文本一致，英文本中“safety”(安全)一词在经修订的原则 7(b)中被改为“protection”(保护)。“protection”对应于法文本中的“Protection”，从这项规定对诽谤和可能危机委员会成员保护真相的能力的其他法律程序的具体关注来看，该词比“safety”更加合适。

27. 经更新的原则 7(c)反映了最近的经验，突出了在真相委员会、国际刑事法庭和暴力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问题的其他机构任命方面确保男女平衡的重要性。例如，最近的真相委员会鼓励性暴力女受害者提供证词，它们让她们向女性专员和工作人员提供证词。⁴⁰ 同样，少数人群体的成员，在受害者中总常常数量格外多，⁴¹ 有时也是侵犯行为的目标，他们在真相委员会中的公平代表也可能提高这些受害者对诉讼程序的信心，同时也能确保社会各成员平等参加公共生活的权利。

28. 经修订的原则 8 述及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它根据上文第 5-10 段所述的一般性考虑承认原则 7。例如，原则 7(b)表明，真相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该”规定这种机构寻求执法当局援助和采取其他具体规定的措施的条件，而经修订的原则 8(a)表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可重申它的权利：在需要时争取执法部门的协助”，并采取其他调查措施。如此措词，是为了避免无意间有这样的含义：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限制委员会争取执法当局的合作的能力，同时承认在职权范围中(而不是在业务程序中或者在要求警察和其他机构与调查委员会合作的立法中等等)具体规定委员会的调查权利的必要时程度可能视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经修订的原则 8 的标题也避免使用可能无意间含有真相委员会不得确立对侵犯行为的非法律责任的意思的语言。⁴² 真相委员会可以确立，而且常常确立了非法律责任，其形式适合于它们的授权，例如，它们确认可能犯罪的人的姓名。

29. 经修订的原则 8(b)采用了“或者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一语，它说的是调查委员会应获授权采取的保护措施，提高原则 7(c)所考虑的措施的效力，同时反映真相委员会行使的更加全面的权利。

30. 经更新的原则 8(c)和(d)处理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范围，包括明确提及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近期的真相委员会通常对严重违反这种法律的行为作调查，这是在第 2004/72 号决议中受到欢迎的一个新发展。⁴³

31. 经修订的原则 8(f)和原则 10(d)反映了最近的经验，突出表明：必须确保除了在原来告知信息来源的条件下，不泄漏向调查委员会秘密提供的信息。这些条件应保护受害者和其他证人受到过早或者有害的泄漏信息之害。记录保密的期限视其性质，并依当地标准和当时的安全关注等，而有所不同(如对于涉及性暴力的文件，禁止期较长可能是适当的)。⁴⁴ 经修订的原则 10(d)也合并了原则 9(b)，同时根据上文第 9 和第 18 段所述的考虑对后者作了更新。

3. 证明侵犯情况的档案的保存和查阅

32. 保存经修订的原则 14(对应于原则 13)所述档案的技术措施应被理解为包括保护纸页、影像、音像和其他文件以及使用微型胶卷的措施。在有些情况下，如当一个即将下台的政权企图销毁它侵犯人权的记录时，必须紧急采取这种措施。如果可能和适当，应制作档案的副本并存放于不同的地点。除了档案的实际保存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外，原始文件应保留在有关国家，即使在有正当理由转移档案的情况下，这种记录留在有关国家境外的期限也只应该是有限的。这些一般性准则必须以国际刑事法庭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或要求为准，因为国际刑事法庭可能会要求国家提供原始文件。

33. 经修订的原则 15 第 3 段承认必须“合理限制”查阅档案，“以保护受害人和其他个人的隐私和安全”。该段所载的保障措施的保障可主要适用于秘密提供信息的个人，包括参加证人保护方案的个人，这种方案规定不得公开透露他们的身份或者能间接看出他们是档案中的信息来源的信息。

34. 经更新的原则 16 第 2 句涉及档案部门与法院的和调查委员会的合作问题，它反映了与其他原则所涉作秘密证词有关的考虑。虽然该规定第 3 句保留了这条一般规则：即不得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允许查阅档案(见原则 15)，但它根据最近国际

法和国家惯例的最新发展对这项标准作了完善。⁴⁵ 就修订的案文而言，“合法的国家安全利益”应理解为不包括实际目的或效果是为了使政府不感到窘迫或是为了防止揭露不法行为的限制。⁴⁶

35. 原则 16(b)规定，质疑官方文件的文件应“附于”官方文件之后，但经修订的原则 17(b)对这条标准的拟订略有不同，目的是反映专业档案人员的惯例。特别在电子文件方面，说“对照资料并同时提供”，比说“相互附上文件”更加精确。

C. 取得公理的权利

1. 一般原则

36. 出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见第 6 段)，原则 18 第 1 段经更新变为原则 1。原则 18 的其余案文并入经修订的原则 19，着重于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义务。对案文作了修订，为的是考虑不同的法律制度，并承认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确保国家通过适当执行刑事司法，有效履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义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⁴⁷

37. 非政府组织，即使按原则 18 第 2 段的话来说没有“长期从事公认的保护有关受害者的活动”，但它们在代表受害者方面具有合法利益。特别是在恢复或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期间，最有效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也许不能长期建立；如果最近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得不到援助受害者的地位，受害者获得司法补救的权利可能会被完全剥夺。⁴⁸ 因此，经修订的案文只用了“对此有合法利益的任何非政府组织”一语，而没有用“长期从事公认的保护有关受害者的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一语。经修订的原则 19 第 2 段的案文促请各国保障受害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广泛的法律地位”，这在刑事诉讼的所有适当阶段都适用，只要这些当事方的参加遵守被告的权利，更笼统地说是遵守获得公平和公正审判的权利。⁴⁹

38.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国家确保对犯国际法之下严重罪行的个人提起起诉的一般义务，不仅意味着，如果前一人没有被交给另一法院审判，则必须承担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对嫌疑人提出起诉的责任；而且还意味着，如果适用，必须向其他国家、国际法庭和国际化法院就它们的刑事诉讼提供适当形式的合作。

2. 本国法院、外国法院、国际法院和 国际化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分配

39. 原则 19 处理国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庭之间的管辖权问题，它在经修订的原则 20 中作了更新，以反映最近国际刑事法方面的体制发展。这种新发展有：《罗马规约》生效；既包括国内成份，也包括国际成份的新一代法院的产生，这种趋势的范例是：塞拉利昂特别法院的建立，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组的建立以及根据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授权在科索沃建立的法院；还有可能建立其他国际化的法院，包括在柬埔寨的法院中设立特别审判庭。⁵⁰ 本条原则和其他经更新的原则中提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有可能设立的对国际法之下的严重罪行有适当管辖权的区域法院。

40. 原则 19/经更新的原则 20 第 1 句重申国家对国际法下的严重罪行实行司法的主要责任，它反映了国家确保对犯下残暴罪行的人起诉的一般义务。⁵¹ 原则 19 承认国际刑事法庭在“本国法院还不能够令人满意地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或不能够实际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有共同管辖权，但经更新的原则 20 第 2 句以反映 1993 年以来建立的各国际法庭和国际化法庭的用语重申这种办法⁵² (见上文第 39 段)，这种法庭各自的规约以略有不同的用语规定了它们相对于国内法院的管辖条件。

41. 有时，原则 19 第 1 段/经更新的原则 20 第 1 段第 2 句导致安全理事会设立或核准特设法庭，在适用共同管辖权的罪行方面可优先于国内法院。⁵³ 根据《罗马规约》第 17 条，只有当一国对能适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案件拥有管辖权，但又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真正作调查或提出起诉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以上各种办法包含在经更新的原则 20 第 1 段的案文中，它承认“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化刑事法庭”“可按照各自规约的规定”行使共同管辖权。

42. 由于近 12 年来出现了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化刑事法庭，一般可适用的法律义务渊源的要求与这些法庭开展合作，日益成为国家确保起诉国际法下严重罪行的一般义务的重要部分。这一新发展反映在经修订的原则 20 第 2 段中，该段认识到国家有责任确保它们在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化刑事法庭方面充分履行适用的法律义务。⁵⁴

43. 经修订的原则 21 合并原则 20-22。经修订的案文的主旨是，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使本国法院能够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普遍管辖权⁵⁵，并且必须采取措施

使它们能够根据可适用的法律渊源——如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 年《第一号任择议定书》和《禁止酷刑公约》，履行它们的义务，起诉在它们境内涉嫌对具体侵权行为有刑事责任的个人，除非这些个人已经转交另一拥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44. 经更新的案文还反映了上文第 39 段所述的体制发展情况。原则 20-22 着重于国内法院的管辖权(如原则 21(b)提到的引渡所含的意思)，经修订的原则 21 第 2 段则承认国家得履行它们确保为某些罪行提出起诉的义务，它们不仅在不将嫌疑人引渡到另一国的情况下得提起起诉，而且还得将嫌疑人转交国际刑事法庭或国际化刑事法庭起诉。⁵⁶ 实际上，根据有关的法律义务渊源，包括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罗马规约》和各国际化法庭的规约，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必须履行义务，搜索、逮捕并将被指控的嫌疑人转交其中一个法庭。

3. 因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行动而 需对法律规则的合理限制

45. 经修订的原则 22 对原则 23 作了几处更改，原则 23 建议各国“防止为有罪不罚而违反”各项普遍承认的法律学说；经修订的原则 26(b)作了相应的修订，⁵⁷ 第一，经修订的案文按照最近的法律发展情况提到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学说，如《独立研究报告》所述(第 36-37 段)，近期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列入了一些规定：如果以前的诉讼不公正或不独立，或者其目的是为了被告逃避国际刑事责任，或者是如果案件没有得到勤勉的起诉，这些规定则允许对行为已经在国内法院受到起诉的被告重新审判。国内立法机构也通过了类似的规定。

46. 第二，经更新的原则 22 提到了“官方豁免”，这个问题近年来受到司法界的广泛注意，⁵⁸ 已在原则 29(b)中得到承认。如《独立研究报告》所述(第 52 段)，至少是，“官员对属事管辖权的豁免权，不应包括在国际法上被谴责为严重犯罪的行为”。⁵⁹ 最后，提议的案文出于前述原因没有列入关于缺席程序的规定(见上文，第 10 段第 1 句)。⁶⁰ 但是，这项最后修订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因自己的法律制度没有缺席程序而妄自所为，养成或助长有罪不罚：实际上，在缺席调查方面开展国家间合作，一般来说会使调查国更有可能获得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⁶¹

47. 原则 24 第 2 段承认某些罪行无时效，经更新的原则 23 第 2 段按照经修订的国际法下严重罪行的定义对此略作重新措施(见上文第 13 段)；在时效方面略有不

同的规则可能适用于更新的定义中所列的某些罪行，⁶² 这一领域的法律正在演进。因此，经修订的案文没有具体规定哪些国际罪行没有时效，但国际判例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承认这种学说不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国际罪行，而且还适用于酷刑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48. 例如在 *Furundžija*，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第二审判厅认为，“酷刑可能不适用时效”。⁶³ 2000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它关于阿根廷的结论性意见中列入以下建议：“在军人统治期间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其起诉的期限应视必要而定，适用时期可追溯到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所必要的时间。委员会建议在这方面继续作出积极的努力。”⁶⁴ 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废除或考虑废除对酷刑方面罪行的时效。⁶⁵ 在 2001 年以后做出的判决中，美洲人权法院不断指出：“本法院认为，所有的特赦规定，时效规定和为逃避责任而采取的措施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限止调查和惩罚对服刑、法外处决、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以及强迫失踪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的人，这些行为之所以都受到禁止，是因为它们侵犯国际人权法承认的不可克减的权利。”⁶⁶

49. 这些最新发展情况中反映的方法对克服对性暴力罪的有罪不罚特别重要。在许多国家，国内法律制度不作反应，长期来一直使性暴力受害者无法寻求赔偿。

50. 如《独立研究报告》所述(第 28 段)，“最近的决定……确认，造成法不治罪的大赦与各国惩罚国际法下的严重罪行的责任(原则 18 和 25(a))相抵触”。这种大趋势仍在继续，⁶⁷ 进一步肯定了原则 25(a)/经修订的原则 24(a)，并澄清了它的范围。尤其是，秘书长在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中认为，“联合国支持的和平协定决不能承诺赦免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⁶⁸

51. 国内法院的决定也在继续限制执行过去的特赦。⁶⁹ 智利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裁定，在查明直接受害者死亡的证据之前，强迫失踪是一项持续性罪行，因此，适用于 1973 年至 1978 年所犯人权罪的 1978 年特赦法令不适用于“Miguel Angel Sandoval Rodriguez 案”(2004 年 11 月 17 日)。

52. 原则 27 处理对引渡的限制问题，在经更新的原则 26(a)中作了修订，列入了禁止将嫌疑人向以下国家引渡的规定：“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嫌疑人的人权可能遭受严重侵犯，如可能遭受酷刑、强迫失踪、法外处决、任意处决或即决处决”。

这段案文源自《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第 1 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8 条第 1 款以及《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事件的原则》原则 5。⁷⁰ 经修订的原则 26(a)增加了以下一句：“如果以上述理由拒绝引渡，被请求国应将案件提交主管当局起诉。”这段案文沿袭《禁止酷刑公约》第 7 条第 1 款的语言，同样也适用于国际法下的其他严重罪行。⁷¹ 上文第 45 段概述经更新的原则 26(b)所依据的最近的新发展。

53. 对原则 29 的修订反映在经更新的原则 27 中，使英文本与法文原文趋于一致。此外，原则 29(b)的最后一句另立一段，成为经修订的原则 27(c)，因为原则 29(b)反映的这两种法律学说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原则 29(b)仅用一个段落处理关于上司的责任和官员豁免的学说，而经修订的原则 27(b)则只处理前者，经修订的原则 27(c)则处理后者。

54. 国际刑事法庭的大量判例明确表明，原则 27(b)所反映的上司责任学说应理解为控制下属的权力来自合法当局的个人。⁷² 更一般地说，人权条约机构和其他来源的判例反映了经更新的原则 27 能适用于国际法下的所有严重罪行。⁷³

55. 原则 30 第 1 段有一部分规定：“犯罪者在迫害时期一过后为了得益于法律有关悔过的有利规定，而透露他或其他人所犯的侵权行为，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和其他责任。”这段案文在经修订的原则 28 第 1 段中作更新，删除“在迫害时期一过后”，在“法律有关”与“悔罪”之间加了“披露或”一语。后一项更改考虑到各国内法之间在对犯罪者披露侵犯人权真相方面的奖励措施各有不同。较常见的是，制定这种法律时，有披露的用语多于悔罪。

56. 第一项修订想避免可能产生的含义，即国际法下的严重罪行的犯罪者可能会由于披露了他或他在迫害期间的侵权行为而全部被免除刑事惩罚。这种结果可能不符合《独立研究报告》第 28 至 31 段概述并在上文第 50 段就特赦说明的国际法新发展，也不符合《强迫失踪宣言》第 18 条第 1 款。但是，该宣言明确承认，“对于那些虽参与被强迫失踪行为但能使受害者生还或自愿提供消息从而有助于查明被强迫失踪案件的人”，国家立法可将这种行为规定为减轻情况，他们可从中受益。⁷⁴ 原则 30 第 1 段/经更新的原则 28 第 1 段第 2 句反映了这种方法的实质，它规定：“披露只能作为减刑的理由，目的是鼓励揭露真相。”

57. 原则 31 处理对军事法院管辖权的限制问题，经修订的原则 29 以简化形式提出。经修订的原则 29 所含的标准，即军事法院不应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行使管辖权，也反映在《强迫失踪宣言》第 16 条第 2 款中，并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各项决议以及人权条约机构的惯例中得到了确认。⁷⁵

D. 获得赔偿权/不再发生的保证⁷⁶

1. 一般原则

58. 原则 34 第 1 段/经更新的原则 32 第 1 段重申受害人有权获得以刑事、民事、行政或纪律诉讼程序形式提供的随时可得、迅速和有效的补救”，它反映了国际人权法的一项既定规则。⁷⁷ 如人权条约机构的判例法不断重申的那样，“如果侵权行为……特别严重”，受害人必须能诉诸司法补救。⁷⁸ 在不影响这项权利的情况下，最近的经验证实了大规模暴行后国家赔偿方案的重要作用。⁷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的范围特别大，行政方案能便于向受害人发放充分、有效和迅速的赔偿。这一新发展反映在经更新的原则 32 第 2 段第 1 句中。

59. 关于有效设计行政赔偿方案的若干见解可以从最近的经验中吸取：⁸⁰

- (a) 理想的是，方案应“完整”，因为受益人的阶层应恰好是受害者阶层。为此，在确定可以产生这种利益的罪行类别时应特别谨慎。这些类别的选择常常没有将传统上被忽视的人，包括妇女和一些少数人群体排除在获益的范围之外。(当然，向所有受害人作出赔偿，并不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得到相同的赔偿款。);
- (b) 能否在向所有受害人提供赔偿方面达到完整性，与方案的综合性有关，即与方案要补救的罪行类别的范围有关。狭隘地着重于某类罪行，会不公平地将大量受害者排除在外，也可能会使被排除在外的受害人的诉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留在政治议程上而得不到解决；
- (c) 为了能够向所有有关罪行类别的所有受害人提供利益，就必须设计一项方案，分发各种各样的物质给付和象征性给付，并以一贯之地这样做。赔偿方案，如果在它发放的各种给付之间建立互补或相互支持的关系，则具备了内部的协调一致；

- (d) 赔偿方案的运作还应与其他司法措施协调。如果赔偿方案在没有其他司法措施的情况下运作，它分发的款项可能会被人看作是国家企图用来收买受害人及其家属，使其沉没或默认的资金。因此必须保证赔偿努力与其他司法行动一致，包括刑事起诉、说明真相和体制改革；
- (e) 如果赔偿方案的两个关键目标是对受害人作出承认(不只是承认他们受害人的地位，而且还要承认他们的公民地位和平等人权的享受者)和提高他们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就必须让受害人参与设计和落实该方案的进程。

60. 原则 35/经修订的原则 33 的主要目标是落实获得补救的权利，执行推广方案，让尽量多的受害者了解他们行使这项基本权利的程序。⁸¹ 第 1 句通过“尽可能最广泛的宣传”一语援用这项目标。这一短语应理解为包括在查明赔偿方案潜在受益人方面可能在有些情况下比通过公众媒体传播更为有效的其他适当措施。最近的经验还突出表明，必须确保性暴力受害者知道他们所遭受的侵犯也包括在赔偿方案中，较一般地说，确保属于传统上被忽视的群体的受害人能够有效地行使他们获得赔偿的权利。除了确保有效执行赔偿方案以外，在需要恢复或者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的情况中，传播关于可适用的程序信息，可以推进赔偿方案的两个核心目标：承认受害人是与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促进他们对国家机构的信任(见上文第 59(e)段)。⁸²

61. 原则 36 第 1 段在原则 34 第 1 段中作了修订，删除了“得到复原、补偿权和康复的权利有关的”等字后的“个别”一词，还删除了“诸如满意等的”等字后的“一般性”一词。如关于赔偿的原则草案最近的文本所反映的那样，⁸³ 复原、赔偿和康复的权利不仅仅涉及“个别措施”；还正如原则 36 第 1 段的案文可能含有的意思那样，满足的措施不只是作为“一般性措施”才适用。⁸⁴ 经更新的案文将原则 36 第 1 段中近年来修订的关于获得赔偿权的原则和准则草案的早期文本改为较一般地提及国际法原则。⁸⁵

62. 原则 36 第 2 段重申：“就被迫失踪案件而言，一旦查清了失踪者的生死，其家属享有无时效限制的了解其生死的权利。”经修订的案文，删除了“一旦查清了失踪者的生死”这一短语，以免无意间含有限制家属了解被迫失踪的直接受害者生死的权利的意思。如各人权条约机构的判例⁸⁶和《强迫失踪问题宣言》的案文

重申的那样，家属了解强迫失踪直接受害者的生死的权利不受限制；国家，不管在何时，只要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发生了强迫失踪案，就必须作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⁸⁷ 而且必须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生死为止”。⁸⁸

63. 在“获得赔偿权的适用范围”的标题下，原则 36 第 2 段写经更新的原则 34 第 2 段所处的位置应作一番简要说明。如《独立研究报告》反映的那样，家属了解强迫失踪直接受害者生死的权利既有实质的一面，也有补救的一面。前者反映在各监督机构的判例中，即承认当局未能将强迫失踪直接受害者的生死通知亲属，其本身就是侵犯了人权，如亲属不受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权利，生命权和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得到尊重的权利。⁸⁹ 知情权的补救方面反映在各人权条约机构，特别是美洲系统的判例中，它们明确承认了解强迫失踪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具有赔偿性的效果。⁹⁰ 按照这种方法，监督机构在关于对违反人权条约的赔偿/补救的决定、意见或判决中下令或建议有关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澄清强迫失踪和剥夺生命权等等与严重侵犯人权有关的情况，并在适用的情况下查明受害者的尸体，交给他或他的近亲。⁹¹

2. 不再发生侵权行为的保证

64. 原则 35—38 按照若干一般性考虑对原则 37-42 作了修订。最重要的是，对关于确保不再发生侵权行为的准则作了更新，以反映近期国家惯例和国际法有关原则的最新发展。原则 37-42 的某些方面反映了一些为人关注的问题，在起草《原则》时，这些问题是拉丁美洲和其他区域在恢复或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的时期所特有的。对有关的规定作了更新，以反映在恢复或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期间在世界几乎每个地区都产生或发现的其他问题，其中有些在最近通过的国际法文书中受到了注意。

65. 经修订的案文牢记这些考虑，列入了《原则》没有包括的一些准则，包括有关公民监督体制的标准、⁹² 人权培训、⁹³ 以及使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退役和融入社会。⁹⁴ 此外，对有些原则的重点按最近的经验作了扩大。例如，原则 39 处理废除紧急状态法的必要性，因为这种法律危害基本权利，但经修订的原则 38 则承认在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期间必须开展更广泛的立法改革，以保障人权和民主体制。⁹⁵

66. 更一般地说，经修订的案文反映了国家、联合国以及在应付武装冲突和/或有系统的迫害后的司法挑战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其他机构和组织的累积经验。经更新的原则吸取了这种经验，例如，这些原则承认必须全面注意体制改革这一可持续司法的基础。⁹⁶

67. 经修订的原则 36(d)在确保公共机构按国际人权标准运作所必须的措施中列入了民事申诉程序。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是一项……战略。事实证明，在司法系统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之前，这种战略很可能有助于恢复法制……以及保护弱势群体”。⁹⁷ 如《独立研究报告》所述，另一个“最近在一些国家，监察专员或公共检查官办公室成为更加重要的机构”。⁹⁸

68. 最近的经验证实必须“审查公职人员，以查出与过去侵害行为有关的人”，⁹⁹ 将这种做法作为不再发生侵害行为的保证，而人权条约机构则承认审查对履行国家防止侵犯人权的一般义务所发挥的作用。¹⁰⁰ 在涉及恢复或过渡到民主和/或和平的情况中，审查还能在弥合积极参加过去侵犯行为的人数与司法系统(国家或国际)起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所有人之间的“有罪不罚差距”方面发挥作用。

69. 经修订的原则 36(a)对原则 40—42 所载的准则的大部分作了合并，处理了审查的必要性问题。经修订的案文的开头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和职员，特别是涉及军事、安全、警察、情报和司法等部门的官员和职员，凡对重要侵犯人权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不应继续在国家机构中任职。将他们撤职，应遵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和不歧视原则。”该准则所述的正当程序标准包括通知应对他们的指控而受到调查的当事方，向这些当事方提供“机会，向进行审查的机构作出答辩”，向受到指控的人提供“关于指控他们的合理通知，对指控作出抗辩的权利以及向法院或其他独立机构就不利本人的裁判提出上诉的权利”。¹⁰¹ 经修订的原则 36(a)反映了人权监督机构的最近案例以及专门程序的最近做法，¹⁰² 包括了以下准则：应对国际法之下的重要罪行负有个人责任而受到正式起诉的人，在刑事诉讼或纪律诉讼期间应暂停公职。”¹⁰³

二、结 论

70. 本报告以及在此之前的独立研究报告，在国家和国际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记载了《原则》经提交以来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在这期间，在有些遭受独裁蹂躏的国家，在起诉方面看上去不可攻破的障碍已被克服；国家提供了合作，确保向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起诉政府最高级官员；国内成份和国际成份相结合的新一代法院进入了对残暴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行列；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工具范围日益扩大，设计和执行有效的反有罪不罚方案的专门知识和真知灼见的积累日益加深，都使政府和民间社会从中受益非浅。这些进展使得有必要更新《原则》，但《原则》本身对促进这些发展发挥了特别有影响的作用。经更新的原则所反映的修订的内容反映了这些发展所留下的印记；如本报告一开始所述，最近在法律和惯例中的新发展有力地肯定了《原则》，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它的范围。

注

¹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3/72, para. 16.

² E/CN.4/2004/88, para. 6.

³ The full text of government replies is availabl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⁴ This study further benefited from the views of NGO representatives who participated in a meeting convened by the New York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on 18 October 2004; input provided by Morton Halperin, Trudy Huskamp Peterson and Julissa Mantilla; and research assistance provided by Jamal Jafari and Aytul Sogukoglu.

⁵ E/CN.4/2004/88, p. 2.

⁶ Ibid., para. 8.

⁷ Ibid., para. 10.

⁸ Reflecting its comprehensive nature, revised principle 1 also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the right to the truth.

⁹ E/CN.4/2004/88, para. 11.

¹⁰ Ibid.

¹¹ S/2004/616, para. 17.

¹² E/CN.4/Sub.2/1997/20/Rev.1, annex II, principle 7 (e).

¹³ E/CN.4/2004/88, para. 5.

¹⁴ S/2004/616, p. 1.

¹⁵ For example, by defining “archives” as certain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the updated text reflects the report in which Mr. Joinet submitted the Principles to the Sub-Commission - which notes that the Principles include measures “aimed at preserving archives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CN.4/Sub.2/1997/20/Rev.1, para. 18) - as well as developments reflected in para. 30 and note 43 of this report.

¹⁶ E/CN.4/Sub.2/1997/20/Rev.1, para. 49.

¹⁷ See, e.g. the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 *Prosecutor v. Duško Tadić*, Case No. IT-94-1-AR72, 2 October 1995, para. 134; and the judgement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0 February 2001 in *Prosecutor v. Delalić et al.*, Case No. IT-96-21-A, paras. 163-73.

¹⁸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955 (1994), annex, art. 4 (1994).

¹⁹ See especially art. 8 (2) (c) and (e).

²⁰ E.g.,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ase 10.480, *Lucio Parada et al.* (El Salvador), report No. 1/99, para. 116 (by implication).

²¹ See E/CN.4/2004/88, para. 26.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ffirmed its longstand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 general comment No. 31 (2004):

“Where [investigations required by Article 2, paragraph 3] reveal violations of certain Covenant rights, States Parties must ensure that those responsible are brought to justice. As with failure to investigate, failure to bring to justice perpetrators of such violations could in and of itself give rise to a separate breach of the Covenant. These obligations arise notably in respect of those violations recognized as criminal under eith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torture and simila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art. 7), summary and arbitrary killing (art. 6)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s. 7 and 9 and, frequently, 6). Indeed, the problem of impunity for these violations ... may well b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ng element in the recurrence of the violations” (para. 18).

Similarly,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interpreted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require States parties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uch as torture,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 and forced disappearance”. Barrios Altos case (*Chumbipuma Aguirre et al. v. Peru*), judgement of 14 March 2001, para. 41.

²² See, e.g., *Regina v. Bow Street Metropolitan Stipendiary Magistrate and Others, 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No. 3), judgement of 24 March 1999 [2000] AC 147, 198 (characterizing

torture as an international crime subject to universal jurisdiction).

²³ See, e.g., the judgement rendered by Trial Chamber II of ICTY, *Prosecutor v. Furundžija*, Case No. IT-95-17/1-T, on 10 December 1998, para. 156 (recognizing torture as an international crime subject to universal jurisdiction).

²⁴ Se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s. 4-7;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Slave Trade, and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 art. 6.

²⁵ See, e.g.,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4 (1) (1992);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principles 1 and 18 (1989);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Executive Committee, Conclusion on Legal Safety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of Refugees (No. 101 (LV) - 2004), para. (g). The revised definition reflects the premises underlying Commission resolution 2004/72, para. 3, which recognizes “that amnesties should not be granted to those who commit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at constitute crimes”.

²⁶ Although the Principles do not use the term “truth commission”, their provisions relating to commissions of inquiry are especially pertinent to this type of commission. See E/CN.4/Sub.2/1997/20/Rev.1, para. 18 (indicating that proposed measures concerning commissions of inquiry are addressed to situation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 context in which truth commissions have typically operated).

²⁷ S/2004/616, para. 50. The definition set forth in the addendum introduces the word “usually” before the phrase “committed over a number of years”, recognizing that in some contexts abuses may have taken place over a shorter period. This definition would not generally cover commissions of experts appointed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examine a situation involving mass atrocities and to report it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See, e.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64 (2004), para. 12 (request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appoint a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 connection with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human rights law in Darfur, Sudan). The definition included in the revised principles would, however, cover some commissions of inquiry, such as the Commission on the Truth for El Salvador, that have occasionally bee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implementing the terms of a peace accord.

²⁸ See E/CN.4/2004/88, paras. 14-23. The right to learn the fate of a disappeared relative (see principle 3) i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s embodied in article 32 of Additional Protocol No. I of 1977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found that violations of principle 3 breach article 7 of the ICCPR. See, e.g., *Staselovich v. Belarus*, communication No. 887/1999, para. 9.2 (2003).

²⁹ At least 15 truth commissions have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1997. In late 2004 preparations were under way for truth commissions in Liberia,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donesia and Burundi. See Priscilla Hayner, *Verdades innombrables: Cómo trabajan las comisiones de la verdad*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exico City, forthcoming 2005).

³⁰ See, e.g., the judgement of Trial Chamber II in *Tadić*, 7 May 1997, para. 646;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para. 18.

³¹ See E/CN.4/Sub.2/1997/20/Rev.1, para. 17.

³² See E/CN.4/2004/88, para. 10; see also S/2004/616, para. 26.

³³ See, e.g., the reference to “truth trials” in Argentina in E/CN.4/2004/88, para. 16.

³⁴ Some truth commiss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peace accords. Even in these situations, it is desirable to secure the broadest possible public input into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omposition and mandate of the commissions.

³⁵ See E/CN.4/2004/88, paras. 12-13; S/2004/616, para. 17.

³⁶ See draft “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the right to a remedy and reparation for victims of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dated 1 October 2004 (E/CN.4/2005/59, Annex I)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8 (“Where appropriate, ... the term ‘victim’ also includes ... persons who have suffered harm in intervening to assist victims in distress or to prevent victimization.”)

³⁷ E/CN.4/Sub.2/1997/20/Rev.1, para. 19.

³⁸ Se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to Truth Commissions”, OHCHR (forthcoming 2005).

³⁹ See especially principles 17-20.

⁴⁰ See E/CN.4/2004/88, para. 19 (f). Cf. Rome Statute, art. 36 (8) (a) (iii), which provides that States parties to the Rome Statute “shall, in the selection of jud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 for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nd male judges”.

⁴¹ See S/2004/616, para. 25.

⁴² Principle 7 (a) provides that commissions of inquiry “are not intended to act as substitutes for the civil,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courts, which shall alone have jurisdiction to establish individual criminal *or other* responsibility” (emphasis added). The corresponding text of revised principle 8 provides that “criminal courts alone have jurisdiction to establish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is change clarifies without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principle 7 (a). Indeed, principle 8 explicitly recognizes that commissions of inquiry may, under defined circumstances, implicate individuals as likely perpetrators.

⁴³ Para. 12 (welcoming the establishment in some State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to addre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ore generally, resolution 2004/72 makes repeated reference to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⁴⁴ See Trudy Huskamp Peterson, *Final Acts: A Guide to Preserving the Records of Truth Commissio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5).

⁴⁵ See generally 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on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1996)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cf. Rome Statute, arts. 72 and 93 (4).

⁴⁶ Se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principle 2 (b).

⁴⁷ See E/CN.4/2004/88, para. 44.

⁴⁸ The premise underlying updated principle 19, which recognizes that criminal prosecution plays a necessary role in combating impunity for serious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as been strongly affirmed in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For example,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recognized that “purely disciplinary an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cannot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adequate and effective remedi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 paragraph 3, of the Covenant, in the event of particularly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notably in the event of an alleged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Bautista v. Colombia*, communication No. 563/1993, para. 8.2, CCPR/C/55/D/563/1993 (1995). See also *Arhuaco v. Colombia*, communication No. 612/1995, para. 8.2, CCPR/C/60/D/612/1995 (1997); *Coronel et al. v. Colombia*, communication No. 778/1997, para. 6.2, CCPR/C/76/D/778/1997 (2002). When such violations occur,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entails recourse to criminal processes.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observed: “All the States party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have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to punish the perpetrators and accessories after the fact in said violations. And any person who considers himself or herself to be a victim of such violations has the right to resort to the system of justice to attain compliance with this duty by the State, for his or her benefit and that of society as a whole.” *El Caracazo v. Venezuela* (Reparations), judgement of 29 August 2002, para. 115. More generally, the Court has recognized that States parties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have assumed an “obligation to avoid and combat impunity, which the Court has defined as ‘the total lack of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capture, trial and conviction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violations of the rights protected by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Trujillo Oroza v. Bolivia* (Reparations), judgement of 27 February 2002, para. 101.

⁴⁹ Cf. Rome Statute, art. 68 (3).

⁵⁰ See E/CN.4/2004/88, paras. 24, 39.

⁵¹ Se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detection, arrest, extradition and punishment of persons guilty of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074 (XXVIII) (1973);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s. 5-7 (1984);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principle 18 (1989);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14 (1992);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4/72, para. 2.

⁵² See S/2004/616, para. 40 (“Of course, domestic justice systems should be the first resort in pursuit of accountability. But where domestic authorities fail to discharge thei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a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prosecute violators at home,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comes crucial.”) See also para. 48.

⁵³ See ICTY Statute, art. 9; ICTR Statute, art. 8; Statute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rt. 8.

⁵⁴ The obligations to which this text refers include duties deriving from 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uch as those set forth in Council resolutions 827 (1993), para. 4 and 955 (1994), para. 2; duties assumed by States parties to the Rome Statute; and obligations assumed pursuant to other treaties, such as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erra Leon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16 January 2002) (see especially article 17).

⁵⁵ See the judgement of ICTY in *Furundžija*, op cit. note 23, para. 156 (recognizing the right of every State to prosecute and punish the authors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such as tortur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principle 18 (“Governments shall ensure that persons identified by the investigation as having participated in extralegal, arbitrary or summary executions in any territory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re brought to justice. Governments shall either bring such persons to justice or cooperate to extradite any such persons to other countries wishing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This principle shall apply irrespective of who and where the perpetrators or the victims are, their nationalities or where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Belgium*); Merits, Judgement of 14 February 2002, *I.C.J. Reports*, 2002, joint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s Higgins, Kooijmans and Buergenthal, paras. 61 and 65 (concluding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the exercis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over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bid.*,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Koroma, para. 9 (expressing the opinion that, “together with piracy,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s available for ...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cluding the slave trade and genocide”); *ibid.*,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Van den Wyngaert, para. 51 (expressing the view that international law clearly permits universal jurisdiction for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⁵⁶ The four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and Additional Protocol No. I of 1977 requir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to prosecute persons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or to have ordered the commission of grave breaches of the treaties unless they hand the suspects over for trial to an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that has made out a *prima facie* case. See, e.g.,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art. 146. According to the leading commentary on the Geneva Conventions,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exclude handing over the accused to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hose competenc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CRC, *IV Commentary on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Jean Pictet (ed.), 1958, p. 593.

⁵⁷ Revised principle 26 (b) is adapted from the text of article 20 (3) of the Rome Statute.

⁵⁸ See, e.g., *Prosecutor v. Charles Ghankay Taylor*, case No. SCSL-2003-01-I, Appeals Chamber, Decis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31 May 2004 (denying Head of State immunity to individual indicted by prosecutor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tribunal); *Regina v. Bow Street Metropolitan Stipendiary Magistrate, 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op. cit. at note 22 (denying immunity to former Head of State in relation to charges of torture in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Jones v. Saudi Arabia et al.*, [2004] EWCA Civil 1394 (concluding that foreign officials are not entitled to blanket immunity in relation to charges of systematic torture in civil actions).

⁵⁹ See also I.C.J.,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Belgium*), op. cit. at note 55, joint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s Higgins, Kooijmans and Buergenthal, para. 74 (“Now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in the case of [serious international] crimes, which are often committed by high officials who make use of the power invested in the State, immunity is never substantive and thus cannot exculpate the offender from person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where public officials or State agents have committed violations of Covenant rights “recognized as criminal under eith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torture and simila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art. 7), summary and arbitrary killing (art. 6)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s. 7 and 9 and, frequently, 6),”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may not relieve perpetrators from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s has occurred with ... prior legal immunities and indemnities” (para. 18); *Jones v. Saudi Arabia et al.*, op. cit. at note 58, opinion of Lord Justice Mance, paras. 83-84 (distinguishing the immunity of a State *ratione personae* from the immunity of a State’s officials *ratione materiae* in respect of claims of systematic torture); *ibid.*, para. 92 (concluding that, “whatever the position may be apart from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it can no longer be appropriate to give blanket effect to a foreign state’s claim to state immunity *ratione materiae* in respect of a state official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acts of systematic torture.”).

⁶⁰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updated principles do not include a provision corresponding to principle 28.

⁶¹ Cf. I.C.J.,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Belgium*), op. cit. at note 55, joint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s Higgins, Kooijmans and Buergenthal, paras. 57-58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exclude the issuance of an arrest warrant for non-nationals in respect of offences occurring outside a State’s jurisdiction and “there is no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 which makes illegal cooperative overt acts designed to secure [the] presence [of persons committing international crimes] within a State wishing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⁶² Article 17 (3)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requires that, where they exist, statutory limitations relating to act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must be “substantial and commensurate with the extrem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See also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para. 18 (“unreasonably short periods of statutory limitation in cases where such limitations are applicable” should be removed in respect of torture and simila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summary and arbitrary killing;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icle VII of the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provides that criminal prosecution for the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If,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a norm of a fundamental character preventing application of [this] stipulation ..., the period of limitation shall be equal to that which applies to the gravest crime in the domestic laws of the ... State Party”.

⁶³ Op. cit., at note 23, para. 157.

⁶⁴ CCPR/CO/70/ARG, para. 9.

⁶⁵ See, e.g.,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urkey, CAT/C/CR/30/5, para. 7 (c) (2003); Slovenia, CAT/C/CR/30/4, para. 6 (b) (2003); Chile, CAT/C/CR/32/5, para. 7 (f) (2004). See also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Venezuela, CAT/C/CR/29/2, para. 6 (c) (2002) (commending a provision of Venezuela's Constitution declaring, inter alia, that action to punish human rights offences is not subject to statutory limitations).

⁶⁶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arrios Altos case (*Chumbipuma Aguirre et al. v. Peru*), op. cit. at note 21 (emphasis added). See also *Trujillo-Oroza v. Bolivia*, op. cit. at note 48, para. 106; *El Caracazo v. Venezuela*, ibid., para. 119; *Myrna Mack Chang v. Guatemala*, judgement of 25 November 2003, para. 276.

⁶⁷ In general comment No. 31, for example,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affirmed that States parties to the ICCPR may not relieve public officials or State agents who have committed violations of the Covenant that are recognized as criminal under eith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 "from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s has occurred with certain amnesties" (para. 18).

⁶⁸ S/2004/616, para. 10; see also para. 32. In its repor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implicitly affirmed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ience in opposing an amnesty in the 1999 Lomé peace accor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overed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see E/CN.4/2004/88, para. 31). The panel observed: "We must learn the lesson: peace agreements by Governments or rebels that engage in or encourage mass human rights abuses have no value and cannot be implemented." A/59/565, para. 222.

⁶⁹ See E/CN.4/2004/88, para. 30.

⁷⁰ See also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5 (extradi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gal standards and subject to international legal requirements 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form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⁷¹ See sources cited in note 51.

⁷² See, e.g., the judgement of ICTY Trial Chamber II in *Prosecutor v. Delalić et al.*, 16 November 1998, paras. 370-378, aff'd by the judgement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p. cit., paras. 186-198; Trial Chamber I, judgement of 25 June 1999 in *Prosecutor v. Zlatko Aleksovski*, case No. IT-95-14/1, paras. 76-78, and the judgement of the Appeals Chamber in the same case, of 24 March 2000, para. 76; ICTR, *Prosecutor v. Kayishema and Ruzindana*, Trial Chamber, judgement of 21 May 1999, paras. 217-223, aff'd,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reasons) of 1 June 2001, paras. 293-294. See also Rome Statute, art. 28 (reflecting the principle that superior responsibility can be established by virtue of effective authority and control).

⁷³ See, e.g.,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rt. 2 (3); Declaration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6 (1) and art. 16 (3);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para. 18.

⁷⁴ Declaration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4 (2).

⁷⁵ See report submitted by Mr. Emmanuel Decaux on the issu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rough military tribunals (E/CN.4/Sub.2/2004/7), para. 18; see also E/CN.4/Sub.2/2004/7, principle No. 3.

⁷⁶ This section heading has been changed from “Right to reparation” to “The right to reparation/guarantees of non-recurrence” to reflect the two principal subsections of this portion of the Principles. As the previous section heading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Principles reflected,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have often treated guarantees of non-recurrence as a component of reparations; so, too, does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the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see, e.g., draft principle 18).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have also treated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as a distinct and general obligation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relevant treaty; both approaches are reflected in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s general comment No. 31 on article 2 of the ICCPR. (See paras. 16-17.) Cf.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draft arts. 30-31,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t its fifty-third session (2001),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y-six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0* (A/56/10), chap. IV.E.1 (recognizing distinct obligations of a Stat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to “offer appropriate assurances and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if circumstances so require” on the one hand and “to make full reparation for the injury caused by the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on the other hand).

⁷⁷ The principle that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gives rise to an oblig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responsible State to make full reparation for injuries caused by the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is well established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 reflected in draft article 31 (1)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op. cit. at note 76. General comment No. 31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affirms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to reparation, and its integ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in the ICCPR paras. 15-16.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ay also give rise to a duty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See the Hague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rt. 3 (1907); Additional Protocol No. I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rt. 91 (1977);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11.

⁷⁸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ronel et al. v. Colombia*, op. cit. at note 48, para. 6.2. See also *F. Birindwa ci Bithashwiwa and E. Tshisekedi wa Mulumba v. Zaire*, communications Nos. 241/1987 and 242/1987, CCPR/C/37/D/241/1987, para. 14 (1989);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12.

⁷⁹ Cf. E/CN.4/2004/88, para. 60. See also Pablo de Greiff, “Justice and Reparations”, in *Repairing the Past: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 de Greiff (e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thcoming).

⁸⁰ These insights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work of Pablo de Greiff. See, e.g., Pablo de Greiff, “Reparations Effor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hat Compens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Achievement of Imperfect Justice”, in *Repairing the Irreparable: Repar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in South Africa, Charles Villa-Vicencio and Erik Doxtader (eds.) (Cape Town: David Phillips, 2004).

⁸¹ Cf.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s 12 (a) and 24.

⁸² See also E/CN.4/2004/88, para. 59; de Greiff, *op. cit.* at note 79.

⁸³ See note 36 above.

⁸⁴ See *ibid.*, draft principles 8 and 18.

⁸⁵ This formulation avoids the ambiguities introduced by explicitly linking the meaning of one set of draft principles to the text of another set of principles that are still in draft form.

⁸⁶ See E/CN.4/2004/88, paras. 14-15.

⁸⁷ Declaration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13 (1); see also art. 9 (1).

⁸⁸ *Ibid.*, art. 13 (6). Cf.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22 (c) (measures of satisfaction include, where applicable, “[t]he search for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isappeared ... and for the bodies of those killed ...”).

⁸⁹ See E/CN.4/2004/88, paras. 14-15. Cf.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para. 15 (“A failure by a State party to investigate allegations of violations [of the ICCPR] could in and of itself give rise to a separate breach of the Covenant.”).

⁹⁰ See E/CN.4/2004/88, para. 15; see also, *inter alia*, *Trujillo Oroza v. Bolivia*, *op. cit.* at note 48, para. 114.

⁹¹ See, e.g., *Trujillo Oroza v. Bolivia*, *op. cit.* at note 48, paras. 115, 117 and 141 (1); *Staselovich v. Belarus*, *op. cit.* at note 28, para. 11 (2003).

⁹² The importance of civilian oversight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recognition. See, e.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chap. 4;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curity System Reform and Governance: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8/39/31785288.pdf>; Willem F. van Eekelen, *The Parliamentary Dimension of Security Sector Reform*, Geneva Centre for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DCAF), Working Paper No. 120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dcaf.ch/pfpc-ssr-wg/Meetings/Berlin/Van_Eekelen.pdf.

⁹³ See S/2004/616, para. 35 (“Leg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are important catalysts for sustained legal development”);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23 (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 as a guarantee of non-repetition: “Providing, on a priority and continued basi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ducation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training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⁹⁴ The text of revised principle 37 (3) derives from article 6 (3) of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⁹⁵ See S/2004/616, para. 35 (“Legislation that is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that responds to [a post-conflict] country’s current needs and realities is

fundamental”); draft Principles on Reparation, draft principle 23 (h).

⁹⁶ Cf.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1, para. 7 (article 2 of the ICCPR “requires that States parties adopt legislativ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educative and other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order to fulfil their legal obligations”); see generally S/2004/616.

⁹⁷ S/2004/616, para. 31.

⁹⁸ E/CN.4/2004/88, para. 62; cf.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question of torture (E/CN.4/2003/68), para. 26 (k) (“Independent national authorities, such as a national commission or ombudsman with investigatory and/or prosecutorial powe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ceive and to investigate complaints.”)

⁹⁹ S/2004/616, para. 52.

¹⁰⁰ See, e.g.,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rgentina, CCPR/CO/70/ARG, para. 9 (2000), in which the Committee recommended that Argentina tak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persons involved in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re removed from military or public service” after noting its concern “that many persons whose actions were covered by [amnesty] laws continue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or in public office, with some having enjoyed promotions in the ensuing years” and “at the atmosphere of impunity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military rule”.

¹⁰¹ S/2004/616, para. 52.

¹⁰² See, e.g.,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Brazil, CCPR/C/79/Add.66, para. 20 (1996) (“The State party should ensure tha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convicted of serious offences be permanently removed from the forces and that those members of the forces against whom allegations of such offence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be suspended from their posts pending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Colombia, CCPR/C/79/Add.76, para. 32 (1997) (“The permanent removal of officials convicted of serious offences and the suspension of those against whom allegations of such offence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should be ensured.”) and para. 34 (“The Committee also urges that all necessary steps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police accused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tried by independent civilian courts and suspended from active dut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question of torture (E/CN.4/2003/68), para. 26 (k) (2002) (“When a detainee or relative or lawyer lodges a torture complaint, an inquiry should always take place and, unless the allegation is manifestly ill-founded, the public officials involved should be suspended from their duties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y subsequent legal or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¹⁰³ See also Declaration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rt. 16 (1); cf.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art. 15;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principle 3 (b).